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美〕马·拉科夫斯基著

钟长安译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美]马·拉科夫斯基著

钟长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Marc Rakovski
TOWARDS AN EAST EUROPEAN
MARXISM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78

根据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Dongou de Makesizhuyi

〔美〕马·拉科夫斯基著

钟长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94,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 3002·262 定价 0.76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一、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1
二、回顾“市场社会主义”	13
哪些人关心经济改革?	15
改革者的思想	20
改革者的失败	25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稳定	31
三、知识分子	37
哪些知识分子?	41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特征	47
“低级知识分子”	58
地下刊物	62
各种倾向	70
四、两个体系在运转	74
经济组织	79
阶级结构	85
结果	88
技术的发展	93
消费结构	95
经济周期	98
阶级斗争	101

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弯路	108
行政机构的马克思主义	110
列宁主义	114
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	119
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圣典化	128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136
地下马克思主义对抗官方马克思主义	140

一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彼此不相往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在令人不安地涌现出来,但是在对待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关键问题上,它们的态度还是相当一致的,因此我们仍可以称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承认:资本主义是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它必定被消灭;在历史上战胜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使命,而且是其社会结构的基本阶级之一即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任务是要将其自身的知识能力提供给培养工人阶级明确其客观利益的实际锻炼过程。

但在对待另一个大的世界体系,即东欧各国和苏联的看法上,马克思主义中的各种流派却达不成这种最起码的一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各个苏联模式的社会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这一模式的社会是建立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剥削机制上的;还有一些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东欧的工人阶级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但是政权却被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官僚阶层剥夺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期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为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打下经济基础;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模式的发展只不过是步资本主义积累下经济与技术结构的后尘,

因此它只能保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他们中间某些人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化为达到更高级的平等开辟了道路；另一些人则认为，劳动按技术分工所固有的等级差别必然会重新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不平等。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联模式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它是市场经济。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有人会强调废除市场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而其反对者则硬说，没有市场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争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也同样是完全对立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接受目前那些苏联模式的社会，而另外有许多人则希望发生根本性的改革或爆发一场社会革命。某些人期望看到由政治领导人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些人则期望出现由工人阶级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还有些人则寄希望于经济与技术专家。

但是，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当西方那些在主要问题上持不同见解的倾向实际上日益增长的同时，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却似乎在逐渐消失。围绕苏联模式的社会展开的争论，已越来越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之争。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难以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联系，那么在现今的东欧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很难找到了。在那里，你只有在大学里才能找到一批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员，以及少数处于地下状态的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曾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起过桥梁作用的大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

当然，人们只好从苏联模式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结构中去寻求答案。可是再现其历史结构并不等于作出了充分的解释。其实，各种恶劣的社会条件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他们的信念。但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就连那些少数决心逆流而进的人也深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确是事实；这些人接受过对苏联模式的社会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和评价，但在新形势下，他们对这些概念却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只消把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社会所作的各种解释在概念上加以条理化，就能较好地理解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困难。所有这些理论方面的解释，包括最矫揉造作的复杂解释，都可以归结为下述三种看法，即把苏联模式的社会看作社会主义社会，或者看作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因素组成的过渡性社会，或者看作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种看法认为，东欧各国的社会结构取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它产生两个最重要的结果，即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能够就整个社会来计划和组织生产。前者意味着更平等地分配收入，更好地统管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和享有真正的文化民主；后者意味着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更合理地决定社会应优先考虑的问题和更好地满足集体的需要。这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的设计本应成为东欧各国和西方共产党的官方思想，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但官方意识却比这走得更远。由于这种设想还很很不具体，因此为了使爱挑剔的知识分子同路人能接受它，就任意地添加一些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在这一设想中添加进苏维埃俄国最初的不发达状况和强制推行工业化

的历史必要性，从而得出结论说，斯大林主义是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可以用最高政治阶层产生“缺陷”和违反“列宁主义准则”之类的解释来补充这个问题，从而使问题转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何况，人们只需要把这个问题归咎于非斯大林化过程所遇到的困难，就可以使这个问题甚至同那种明确谴责“悲剧性错误”（例如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对格但斯克的大屠杀，或者对苏联国内知识分子异端运动的镇压）的势头协调起来。

第二种看法也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它构成了苏联模式发展的社会主义因素。然而，国家不仅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总利益，而且代表官僚们的特殊利益，即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特权以及他们的显赫地位。为了维护这些特权，使其免受其他社会集团（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干预，官僚阶层试图控制全部权力，不让公众染指。然而，对生产资料支配权的集体垄断还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为了使政府人员的特权成为不可剥夺的和可以继承的权力，必须把国家财产转变为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因而，苏联模式的国家具有二重性：由于它保证了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它正在把社会引向社会主义；又由于它逐渐脱离了工人阶级并为官僚们垄断所有权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而又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种矛盾不会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社会主义胜利，就是资本主义胜利；官僚们的政治统治不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自治所代替，就是被资产阶级企业家的阶级统治所代替。

这种过渡性社会模式是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一方面，它的某些内容具有重大的深远影响。例如，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在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界中，对托洛茨基批判官僚政治的一些主要论点产生了共鸣；但是，只有正统的托洛茨基分子才全部接受了这个概念。另一方面，现今的许多理论见解都是参照它而形成的。例如，在东欧各国实行经济改革的高潮中，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倾向于认为，这些正在进行的改革反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

第三种看法并不完全否认两个体系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某些差异。西欧和东欧毕竟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才达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既然形成时期不同而给已经形成的体制留下了某些标记，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然而，结构上的差异并没有大到使我们能够确认这二者是各不相同的社会形态。在各个重要方面，两个体系的表现都是相同的。例如，两个体系中，都是由完成积累的具体情况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目标的命运；两个体系中，消费的模式和技术专家体制是相同的；劳动分工中贯串着同样的等级原则；专家政治正在逐渐掌握经济实权，等等。这第三种看法是六十年代末的产物，而最早出现在从传统左派分离出来的西方新左派中。

几十年来，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按照第一种看法看待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任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该制度的基本结构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斯大林主义时期，他们甚至

连想都不可能想到摆脱已经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自主的、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在非斯大林化时期才在东欧出现的。就在当时，也不存在创立一个脱离官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旨在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主义”残余，从而重新创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适合于这个社会体系的思想。当然，在对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谴责了政治上的、有时是制度上的“缺陷”。但是，这个时期的非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抱怨过，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只有官方思想的词汇才是社会主义的。恰恰相反，他们提出批评的前提是，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正因为如此，它同政治上的独裁主义、同极端教条主义地忽视群众的需要，或以受控制的宣传来取代文化等现象是势不两立的。

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出现权力之争的时候，也存在一个有利条件，即这个时期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从同样的理论前提出发开展辩论的。这正是非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得以对统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结果施加某些影响的原因，尽管这还不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那种影响。但是，当斯大林之后的制度得到巩固，统治阶级实现了新的团结时，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就很快消失了。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集团真正愿意听取对官方意识形态进行的公开批评。那些真诚地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并敦促领导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已遭到厌弃。当局以压制言论回答了批评，那些过去企图充当政府真正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屈服于这种压制，就是很快转入了地下。

这就是对东欧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解释。显然，这是一场只有从理论上根本改弦易辙才能完全克服的危机。只要我们仍然从苏联模式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理论前提出发，我们所能唯一做到的事就是等待统治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再度提出需要我们效劳。

但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过渡性社会”理论往往是既批评得不中肯，又作些肤浅的辩解。一方面，它预告了国家官僚们会变成资本主义的股东。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预言似乎不会实现，它又补充这样一种意见，即尽管官僚主义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在生产资料和经济积累方面所实行的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托洛茨基主义中，这种辩解性的陪衬手法更加明显，因为它对苏联模式的财产关系、工艺发展、劳动分工和消费方式提不出别的取代方案。这种既批判又辩解的暧昧态度，对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许很有用处，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并生活在严格划分为两部分的冷战世界中，因而既不愿被人看成是支持斯大林主义的，也不愿被人看成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对于在斯大林之后的时期中企图确立知识分子自主地位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只能把问题弄得更糟。

至于“过渡性社会”理论的其他说法也都无济于事。因为其大前提的基本构成就是错误的，其具体细节也就全都是错误的了。人们不可能既把苏联模式的社会看作过渡性社会，又在它的各种阶级关系中推导出一条没有矛盾的道路。只有当社会的各个机构分属于几个对抗性的权力中心，而这些权

力中心之间的关系不是由一些公认的合法机构来调整，而是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公开的斗争时，这样的社会才叫做过渡性社会。只看到集中统一的计划和其他类似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同时存在，就把苏联模式的社会列为过渡性社会，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证实两点，这两点我认为，第一是要体现出生产者的经济权力，第二是要体现出管理者的经济权力，而这两者之间从长远来看又是不可能调节到一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俄在二十年代倒真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国家机器已把俄国城市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而在农村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当时乡村掌握在由小自耕农组成的农民村社手中，而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组织却得不到承认。这两种体制要长期并存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但是，当国家机器通过农业集体化把它的政权扩大到了农村，并通过强制性工业化为这一政权建立了经济基础，苏俄的阶级关系和劳动分工就在一个能够自己进行再生产的一元化体制中一体化了。在东欧各国变成了人们所称为的“人民民主国家”之后，这一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国家。

第三种看法确实避免了“过渡性社会”理论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一般说来，有许多迹象清楚地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相似之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两个体系之间相类似的地方更加明显了：两种社会在消费方式的构成和日常生活的环境方面，其相似之处越来越显著，两者的技术专家体制也没有明显的实质性差别；而且苏联模式的社会在劳动分工方面的等级制结构还未曾解体。尽管人们可以觉察到两种类型的社会，在消费方式的构成、技术专家体制和

等级制的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着具体差别，但其本身相似之处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即使在其他方面，例如按就业情况的周期性变化和特点来说，不同之处比类似之处更为明显，但人们对这些共同点的深刻印象并没有被冲淡。可是两种制度在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方面越是相似，就越是难以避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是在两个制度的一个制度中，工人阶级才能对生活状况施加有组织的影响？为什么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才有工人运动（不管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还是革命的）？毫无疑问，这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来说，都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设法脱离了统治阶级，也同样会遇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概念上对两种社会制度不作任何区别的理论，远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将其束之高阁。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只满足于对当代的一些异化征兆列出一纸清单，他们一定会充分利用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不加区别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文明进行一般性的批判，它还立旨于其他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醉心于“文化悲观主义”的东欧人为什么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探寻他们可以直接从公开的保守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的思想中，能够得到的思想。而在东欧的地下组织中，这些思想是很盛行的，甚至比马克思主义更受欢迎。马克思主义如果要保持它做为一种批判社会的理论的特点，并以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话，它就不能置两个社会制度在组织体制和阶级结构上的差异于不顾。

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社会 的 阐

述，并没有能够使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官方的意识形态决裂。新左翼的阐述也无助于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去克服阻止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其天然阶级基础之间的联系的一些特殊障碍。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在东欧存在下去，它就必须建立在一个崭新的理论基础上面。我提出一种假设，作为我们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即苏联模式的社会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这两种社会制度的混合体。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社会，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的一个不同类型的阶级社会。

可是，一旦人们这样提出问题，很明显，困难不仅在于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了探讨我们上面刚刚提出的第四种假设，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传统结构重新进行探讨。在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中，不可能对一个现代的非过渡性的社会作出解释。在那里虽然不存在私有财产，但生产资料也不是由生产者集体支配；虽然没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但是仍把人们划分为阶级；虽然在正常情况下经济优先项目并非由市场决定，但也不是由联合的生产者通过合理讨论来作出抉择，等等。

当然，正如马克思完全知道的那样，他所称为的“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都和上面提到的、现代的非过渡性社会的情况一样。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当代意义的私有财产和阶级结构，只有资本主义能够产生由主观和客观生产因素组成的市场。但是，马克思越是强调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内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历史性，他的历史主义就越加明显地局限于一般性的对比。马克思只知道一种非资本主

义的当代的发展形式，即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与在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总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在财产、阶级、市场等范畴内会产生一个新的结构，而认为它们会彻底消失。

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局限性，关键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他知道在资本主义形成以前有许多独立的发展道路。例如他说，在古老的印度和中国，部落社会被“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代替；在地中海四围的欧洲，被“古老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被“日尔曼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出现时，这种多方面的发展（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开始急剧地朝着一个方向会聚。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使得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瓦解了，并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就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在发展规模上所表现出来的总的优越性，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并没有简单地淘汰其他所有的阶级社会，而是使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达到顶峰。由于在经济上摆脱了社会的非经济机构，于是一个纯经济的阶级结构便从血缘关系、封建制度、宗教组织和行会等等的复合体中产生了出来；从各种各样个体的和集体的所有制中产生了私有制；从性别、年龄、社会等级和阶层之间各种形式的劳动分工中产生了劳动技术分工；从以相互之间的个人服务网和各种类型的法律义务等为立足点的市场中产生了以供求关系的自动调节机制为立足点的市场。虽然经济依然处于社会的非经济关系的范围之内，它的分类却以许多历史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旦经济脱离了社会的非经济机构，这些早期的形式就不能继续发展，只能有一种纯经济的阶级